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视察制度的由来

□ 郭海南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视察制度从何时确立的呢？让我们走进历史，一探究竟。

张治中最早建议人大代表视察

人大代表开展视察工作，最早是由张治中提议的。据张治中机要秘书余湛邦所写的回忆录《张治中与中国共产党》一书介绍：“1954年全国人大一届一次常委会开过后，张（治中）提出一项书面意见，主张每位常委每年都要出去视察，了解地方情况，听取群众意见。”

这项建议得到了中共中央领导的高度肯定。1955年2月12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信》，信中指出：“常务委员会为了听取人民群众和人民代表的意见，需要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建立经常的联系。请你把自己在生产中、工作中、社会活动中所了解的情况，以及人民群众向你反映的问题和你的意见，随时告知常务委员会。”

随后，在当年5月18日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上，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出发视察工作问题的通知》，建议此次视察在城市中以粮食统销和建设方面的情况为重点，在农村以粮食统购统销和社会治安问题为重点。在视察时，对比比较好的、比较差的和中等的3种类型，至少对前两种都尽可能加以视察。为此，中共中央还专门向地方各级党委和中央各部委党组发出通知，要求代表们定期下去视察工作，使之成为党和国家领导机关联系群众、调查研究的一项工作制度。

人大代表视察工作被正式确立为一项经常性的制度，离不开其他代表的努力。1955年7月，在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青海省代表组提出将全国人大代表及省（市）、州、县（市）人大代表视察工作定为一项经常性制度。全国人大常委对此高度重视，在当年8月6日举行的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上，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视察工作的决定》。

这一文件确定了5方面的内容：一是确定了视察次数和时间。全国人大代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代表，每年可视察两次，春耕、秋收以后为宜。二是确定了视察范围。全国人大代表可到原选举单位的地区或其他地区视察工作，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代表可到原选举单位的地区或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的其他地区视察工作。三是确定了视察方式。视察工作可分组进行，也可以单独进行。四是确定了视察对象。全国人大代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代表视察工作的时候，

可以向当地人民委员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相关人员了解情况；可以接见当地的人民代表，访问人民群众。五是确定了视察保障。在视察地区，可以同当地人民政府接触，各地政府及有关部门应提供方便。

从此，人大代表视察工作被作为一项制度正式确定下来。

毛泽东提议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共同开展视察

毛泽东对人大代表视察制度很是赞赏，并提出加上全国政协委员共同视察的想法。1955年10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议，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进行视察时，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协委员，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代表一同视察，这样对立法有好处，对行政有好处，对领导干部联系群众有好处，对下面干部可以起督促作用。

1955年11月1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在中海紫光阁举行联席会议。会上传达了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关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共同进行视察的提议。根据这个提议，联席会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关于一九五五年秋后视察工作的通知》，拉开了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联合开展视察工作的序幕。

通知规定1955年秋后的视察工作，从11月中旬开始到12月为止，为期一个多月。视察内容有农业合作化、粮食生产、粮食统购统销、落后乡的改造、工商业的生产经营、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街道工作等问题。全国人大代表可以到原选举单位的地区或者其他地区视察，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代表可以到原选举单位的地区或者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其他地区视察；全国政协委员可以选择一个地区视察，地方政协委员在本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视察。视察对象应该包括比较好的、比较差的和中等的3种情况，找人谈话应该找各方面有代表性的人，以便做到全面了解。此外还规定，视察工作出去时要有准备，回来时要有报告，要实事求是，对所视察的工作尽可能作全面的分析和估计。此后，全国人大常委和政协全国委员会把组织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视察分别列入工作日程，每年安排春秋两次视察活动。

（摘自2024年3月14日《人民政协报》）



大山深处的列宁小学

□ 胡遵远

在安徽省金寨县汤家汇镇瓦屋基村，坐落着一座古朴的老院子，它就是全国仅存的两所之一——金寨县列宁小学，其前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县苏维埃政权创办的六区一乡列宁小学。

1929年立夏起义胜利后，鄂豫皖苏区多地都创建列宁小学。1930年春，中共商城县委和红三十二师在瓦屋基村（时属河南省商城县管辖）创办了这所小学，学校由乡苏维埃政府管理，校长由乡苏维埃主席兼任，共青团支部受党的委托领导学校工作。学校创办时，有4个教学班、1个早晚识字班，适龄儿童和成人均可免费入学，学生100多人，教师有专职的也有兼职的，大多为红军官兵和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

学校除了像一般学校注重向学生传授文化知识外，还特

别注重讲授政治常识、军事常识、宣传革命斗争形势，以激发广大学生的爱国热情。学生中年纪较小的参加儿童团、稍大的参加少先队，积极地为红军站岗放哨、传递情报，到红军医院慰问伤病员、帮助红军属挑水打柴做家务。有的师生参加打土豪、抓特务等任务，直接同敌人进行面对面的斗争；有的师生深入群众之中，通过开会、演讲等方式，宣传党的政策、红军的战果、苏维埃政权的性质和任务等。一次，一名女学生在放哨时，发现一个形迹可疑的人，她立即上前盘问，并让同学迅速向红军报告。原来这个人是敌军的“探子”，大家从他身上搜出红军活动的路线和红军领导人家庭住址等情报，使红军部队和红军家属免受严重损失。学生周百莲、吴尚慈在开展宣传活

动时，不幸被敌人逮捕，壮烈牺牲。

在革命风暴中诞生和成长的六区一乡列宁小学，通过校内外教育的紧密结合，使学生得到快速成长，为党的建设、苏维埃政权建设和红军队伍发展输送了大批人才。这所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有的参加红军踏上长征路，有的留在家乡坚持斗争、成为老区的革命火种，有的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流尽最后一滴血，有的走上党政军领导岗位。

1932年秋，红四方面军实行战略转移时，列宁小学的大部分学生参加红军，大部分校舍被国民党军焚毁。1957年，瓦屋基小学和四道河小学合并，迁入六区一乡列宁小学旧址，恢复了列宁小学的校名，称作“金寨县列宁小学”。

（摘自2023年11月9日《中国国防报》）

于化虎：自制地雷 抗击敌寇

□ 张武岳

创造地雷战术30多种，参加战斗300余次……胶东“爆炸大王”于化虎的英雄故事，已通过“地雷战”的小说和影视作品为许多人所熟悉。

于化虎，1914年出生于山东省海阳县文山后村，1940年参加抗日战争，194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家乡带领民兵以自制的踏雷、绊雷、连环雷、夹子雷、钉子雷、梅花雷等20多种地雷为主要武器，有力地打击了日寇，威震胶东。

1944年10月，于化虎等5人受胶东军区委派，到烟潍线给民兵骨干传授制雷、布雷技术，开展历时4个多月的地雷战。

到抗战胜利时，于化虎亲手培养起来的爆炸模范有20多

人，会使用5种以上地雷的爆炸能手多达1400多人。在参加抗战的5年时间里，于化虎的制雷、布雷技术闻名胶东地区。1945年，于化虎被评为“胶东民兵英雄”，胶东军区授予他“爆炸大王”英雄称号。

1949年，于化虎根据组织的安排回到老家文山后村担任村党支部书记。“父亲一生勤劳，热爱劳动，喜欢自己带头干。”儿子于永周说。

文山后村地处丘陵缺水地带，于化虎带领乡亲们修建了许多水塘和水渠，先后在村里办起了砖瓦厂、养鸡场、粉坊、牲畜繁殖站等，带领乡亲们过上好日子。

2004年，于化虎去世，但他

和其他地雷战英雄的事迹一直广为流传。2019年12月26日，山东海阳地雷战党性教育基地启用，基地展示了当地党政军民浴血奋战、英勇杀敌的英雄事迹，以及当地人民敢于担当、舍身报国的家国情怀，供后人观摩瞻仰。

（摘自2020年4月22日《人民日报》）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在西柏坡纪念馆里，收藏着一组珍贵的烈士家书。烈士名叫何文超（曾用名王超），于1947年12月牺牲在攻打元氏城的战斗中，年仅15岁。这些家书是何文超烈士生前写给父母和兄妹的。70多年过去了，虽然信纸已经泛黄磨损，但字里行间流露出的对家人的思念和对革命的坚定信念，依然深深地感动着人们。

一

1933年1月，何文超出生在河北正定县南高营村。他的父亲王雅波和母亲何味琴很早就参加了革命，长期战斗在晋察冀边区。受父母的影响，何文超小小年纪就心向革命，积极要求参军。

1945年，刚满12岁的何文超来到冀中六分区敌工部当警卫员。1946年秋冬，13岁的何文超参加了解放军，成为冀中军区独8旅第22团第3营第8连的一名战士。入伍后，何文超先后担任宣传员、文化教员，参加了正太、清风店、石家庄、元氏等战役。

由于解放战争形势发展迅速，战斗生活十分紧张，何文超母亲与他约定：抽空多写书信，向家人报平安。何文超从参军到牺牲近一年的时间里，从来没有回过家。这些书信是他战斗经历和革命心声的珍贵见证。

1946年12月27日，刚刚入伍的何文超在给父母的信中写道：“我们在这里生活很好，每天上政治课、军事课，借此我可以在军事上懂得一些，我想在这比在学校里学习的东西还多呢！”“今年的旧历年又快到了，我们今年虽然不能在一块过年，可是我想

要比在一块过年还要热闹得多。因为我们在前方过着紧张而又快乐的生活，使我没有一刻不在快乐着！学习着！进步着！”

空闲时间，何文超把父母寄来的《苏联红军英勇故事》一书看了好多遍，制订了为人民立功的计划；英勇作战不怕牺牲；对敌人开展政治攻势；帮助战友学习文化知识的同时，自己也要学习提高；要学会打重机枪和迫击炮……

战斗锻炼了何文超的胆量和军事技术。石家庄战役中，他冲到战斗前沿，以柴堆为掩护向敌人喊话。任凭敌人的子弹打得柴堆沙沙作响，他仍镇定自若地坚持对敌人开展政治攻势。战斗间歇，领导给何文超放了几天假，让他回家看看。当时部队驻地距离他的家乡南高营村只有9公里，但何文超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他把对父母兄妹的思念悄悄埋在心底，仍然坚守在部队，时刻为战斗准备着。

二

参军后不久，何文超笔下的一封信书引起了部队领导的关注。1947年2月9日，《冀中导报》特意刊登了他写给父亲的一封信，以激发部队官兵

一组珍贵的烈士家书

□ 卢润彩 周艳芝



何文超烈士生前写给父母和兄妹的书信，右下为《冀中导报》刊登的何文超家信

兵战斗士气。

何文超在信中这样写道：“我们部队最近转战到最前线。现在我们前方的情况是处在向敌人反击的时期，我们要配合平汉战役，来大量歼灭敌人。”他还向父亲讲述了他参加过的三次战斗的情况：“在这三次战斗中，锻炼了我的胆量和军事技术。以后看吧，我要经常来参加战斗，并且要把



这是何文超烈士在短暂一生中留下的唯一一张照片，摄于周岁

每次战斗的经过，报告您老人家的。”

何文超在信中没有流露出行军的艰难，也没有描述战斗的惨烈，只是充满信心地汇报着一个个胜利的消息。这封信被母亲何味琴小心翼翼地

从报纸上剪下，并精心珍藏起来。1947年11月12日，我军解放了石家庄。何文超写信向父母报告了这一喜讯：“这次我们配合晋察冀野战军把

石门（即石家庄）解放了，我们家也随着解放了，你们一定早就听见胜利的消息了吧！”“这一连串的战斗，实在是把我锻炼得不轻，使我胆量增大了好些，我挨过飞机打又挨过炮打，把我在思想上怕飞机的事又忘了。”“我们部队现在正休息，估计几天又要执行新的战斗任务——攻打元氏城。”从信中看来，随着解放战争节节胜利，何文超与家人团聚的日子已经不远了。不料，这竟是他写给亲人的最后一封信。

攻打元氏城是石家庄战役的一部分。元氏城是石家庄以南约70里的一个城镇。城墙由大方石头垒起，异常坚固。敌人在城墙上凿出密集的枪眼，架上机枪随时准备射击。元氏城守敌4000多人，多是流氓、特务、地主。他们无恶不作，极其反动顽固。

正太战役中，解放军两次强攻元氏城未果。为了不影响整个战役的进行，我军暂时撤出了战斗。当石家庄战役进行时，解放军对元氏城采取了围而不打的作战方针。此时，石家庄获得解放，元氏城守敌便失去了“靠山”。

17日，冀中军区独7旅、独8旅乘胜对元氏城发动了进攻。面对坚固的城墙，作战部队没有强攻，而是从城墙外一直将地道挖到墙根下，然后把

炸药放到棺材里，通过坑道运到城墙下面。

战士们风趣地说：“让敌人也坐坐咱的土飞机。”随着城墙上几个炸点的炸药一起被引爆，四面的城墙都被炸开了二三十米的大口子。浓烟还未散去，战士们就从这些炸开的口子冲杀进去。

12月3日，是攻打元氏城的最后一天。当何文超端着枪，跃过元氏城南门城墙的缺口时，被敌人打伤腰部。敌人趁机扫射，何文超全身多处受伤，壮烈牺牲。

何文超牺牲后，人民政府将其安葬。1952年，母亲何味琴将他的灵柩接回正定县南高营村。后因世事变迁，烈士尸骨无从找到。2007年清明节前，亲人们将何文超的灵位安放在北京八宝山烈士堂。墓碑上铭刻着：“这里长眠的是在解放战争中12岁参加革命、13岁参军、14岁入党、15岁牺牲的何文超烈士。”墓碑上的照片是何文超周岁时的留影，墓里埋葬的则是他所写家书的复印件。2018年12月，何文超烈士的妹妹王新生将这些珍贵的书信捐赠给西柏坡纪念馆。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何文超的生命永远定格在尚且稚嫩的青春，但他勇敢、乐观、一往无前的精神，永远在这片土地上熠熠生辉。

（摘自2023年4月2日《解放军报》）

